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语言文字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苏音润

本卷主编 鲍·包力高 达·巴特尔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语言文字卷

总主编 张建华 薄音湖

本卷主编 鲍·包力高达·巴特尔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语言文字卷/鲍·包力高,达·巴特尔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4.7

ISBN 978-7-5665-0308-4

I. ①内... II. ①鲍... ②达... III. ①文史-内蒙古-文集 ②蒙古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集 IV. ①K29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74561 号

书 名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语言文字卷
主 编	鲍·包力高 达·巴特尔
责 任 编 辑	包文峰
封 面 设 计	敖全英
出 版	内 蒙 古 大 学 出 版 社 呼和浩特市昭乌达路 88 号(010010)
发 行	内蒙古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7
字 数	900 千
版 期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665-0308-4
定 价	2160.00 元(全十二册) 本册定价:180.00 元

声 明

我社已将出版《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使用情况备案到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因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特委托内蒙古自治区版权保护协会代转作者稿酬,并依照《著作权法》相关规定及国家版权局制定的稿酬标准支付稿酬。

联系电话:0471—4967453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编委会

主 任：布小林

副 主 任：张建华 冯永林 孔令勋
门百岁 马庆生 薄音湖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风雷 巴特尔 石玉平 包斯钦 乔 吉 刘国辰
李晓秋 连吉林 何远景 张久和 陈永志 明 锐
赵 英 莫久愚 鲍·包力高

总 主 编：张建华 薄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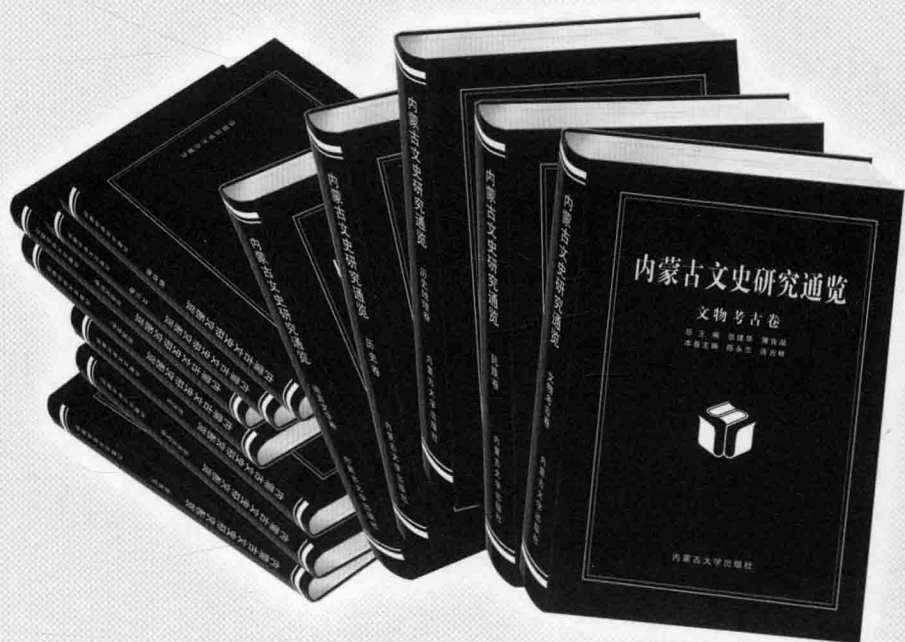
副总主编：孔令勋 何远景

本卷主编：鲍·包力高 达·巴特尔

本卷副主编：王建莉

编务主任：李鲁一 周绍慧

编 务：萨如拉 周秀峰 边保应 段瑞昕 冯丽丽 李 倩
门 洁 胡 静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

- | | | |
|---------|-----------|---------------|
| 《历史卷》 | 主 编：薄音湖 | |
| 《历史地理卷》 | 主 编：莫久愚 | 副主编：于 永 索秀芬 |
| 《文物考古卷》 | 主 编：陈永志 | 连吉林 副主编：娜仁高娃 |
| 《语言文字卷》 | 主 编：鲍·包力高 | 达·巴特尔 副主编：王建莉 |
| 《民族卷》 | 主 编：张久和 | |
| 《宗教卷》 | 主 编：乔 吉 | |
| 《民俗卷》 | 主 编：刘国辰 | |
| 《教育卷》 | 主 编：王风雷 | |
| 《艺术卷》 | 主 编：冯永林 | 副主编：冯丽丽 |
| 《人物卷》 | 主 编：何远景 | 副主编：张 静 冯丽丽 |
| 《文学卷》 | 主 编：包斯钦 | 副主编：潘彩霞 |
| 《文化卷》 | 主 编：明 锐 | 副主编：何砺砢 |

序

中华文化是多元文化的统一,作为其重要一元的草原文化,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适应草原生态环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和积累下来的一种文化形态。随着大量的考古发现和对历史文献的深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流,三种文化的相互碰撞、交流、融合,共同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内蒙古是草原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草原文化,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里有大约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有1万年前的扎赉诺尔人。新石器时代的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人类文明结晶,拓展了中华文化起源,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更为久远的历史,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蒙古高原的统一,彻底打破了区域之间的封闭,打破了原有民族、部族的格局,结束了蒙古高原数千年民族、部族纷争的历史,在建立政权、创造文字、建设都市、繁荣文学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非凡的成就,涌现出了一批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文学艺术家。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源流的草原文化,在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进步和中华文明的繁荣提供滋养的同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时至今日依然生机勃勃,独具魅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它反映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不断推进文明进步的历程。今天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继续和发展,如果隔断历史,就不能全面地、正确地理解现实和展望未来。”在当今文化与经济相互交融、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显的时代,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对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存史的目的在于资政,在于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要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顺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历时三年之久,编纂出了一套共计1000余万字、7万余条文献目录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全套丛书共12个分卷,集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成果之大成,涵盖了历史、教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文化、艺术、人物等诸多方面,为社会文史研究工作者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部内容丰富、翔实的史料。在这套详前史之阔略,补今史之空白的卷帙浩繁的《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付梓之际,谨向参与编纂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

80 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中说,“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资料,苟无法以整理之耶,则诚如一堆瓦砾,只觉其可厌;苟有法以整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研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贡献于世界者皆可以极大。”加强对草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传承和弘扬优秀文化,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将是我们孜孜不倦共同追求的事业。

美丽和谐的内蒙古,不仅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内蒙古,也必定是一个文化繁荣的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布小林

2013 年 7 月

前 言

内蒙古自治区位于中华版图的正北方,国土面积118万平方公里,东西横跨东北、华北、西北,毗邻八个省区,北部与蒙古、俄罗斯两国接壤。千百年来,她以博大的胸怀,造化万物,包容百态,辈出英才,力鼎时代,以其中北方民族特有的传承演进方式,创造了地区人类历史发展的文化与文明。

纵观辛亥革命以来国内外文史研究成果,内蒙古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堪称厚重久远。时至今日,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长江文化正在携手铸就着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恢宏。更应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弘世道,史为国鉴之道理,越来越深入人心,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把握国家和自己的命运的取向,已成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一种先进生产力。说古论今,引经据典等不凡其例,可谓存史资政。

文史研究馆作为政府文史咨询职能部门,理应为之需求提供服务。于是,我们从2011年开始,着手收集整理起迄百年来专家学者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研究内蒙古地区人文社科类的论文和著述,编纂了这部《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旨在为人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内蒙古历史提供方便。全书共分设历史、文物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文化、教育、艺术、文学、语言文字、民俗、人物等十二卷,共计1000余万字。

历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民俗等方面。

文物考古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西夏金元、明清等时期内蒙古大地上的出土文物、遗址考古等方面。

历史地理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道路交通地理、城市城镇(城址)地理、军事地理(长城、关隘、驻防设置)等方面。

民族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族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曾经在内蒙古地区生产生活、繁衍生息的北方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融合演进的过程以及推动近代以来民族关系发展的政策、制度等方面。

宗教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宗教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蒙古族的古老宗教——萨满教,大蒙古国时期的藏传佛教、汉传佛教、道教全真派以及外传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元朝时期佛事活动、佛经翻译与寺庙等方面。

文化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广义文化、狭义文化以及对内蒙古地区文化成果评述等方面。

教育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科举制度、官学教育、私学教育、幼儿教育、民族高等教育、教育制度演变、书院、学校创办等方面。

艺术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艺术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传统与现代艺术领域里的诸多方面。

文学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小说、散文、诗歌、史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方面。

语言文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北方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蒙古方言土语研究、蒙古语语音、语义、语法、词汇等方面。

民俗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内蒙古地区民俗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有史以来繁衍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苍茫大地上,举凡衣食住行、乡社生产、市井商贸、宗族村落、人生仪礼、游戏娱乐等方面。

人物卷:选取辛亥革命以来发表在国内外期刊、杂志上关于为推动和影响内蒙古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方面的研究成果。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

在编纂上述十二卷的同时,我们还编辑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附录卷,纳入通览体系,以目录的形式收录未选入上述十二卷文章的名称、作者与出处。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完成。2013年先期出版六卷。在编纂出版过程中,我们力图通览,求所精华,注重学术,尊重历史,面向未来。但由于时间紧迫,加之水平有限,在通览结构划分上、体例确定上、目录和文章的选辑上以及文稿校对上,难免存在疏漏和不足,恳请批评指正。

《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的编辑出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此,我谨代表内蒙古文史研究馆向参与编辑出版此书的同仁表示感谢,向所有提供文章的作者表示感谢。

我们热爱内蒙古,不仅仅是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更因为这里蕴藏着富集的物质资源与丰厚的文化宝藏。文史研究馆所能做的,并能做到、做好的事情,就是让这些丰厚的文化宝藏再现光辉,让更多的人了解内蒙古、了解内蒙古文史研究百年来的发展与成就,并为之所用。

内蒙古自治区文史研究馆馆长 张建华

2013年6月10日

20 世纪内蒙古语言文字研究^[1]

达·巴特尔 金书包 王建莉

内蒙古地区生息繁衍的猗猗、荤粥、匈奴、室韦、鲜卑等古老民族虽然拥有自己的语言,但未留下完整文字或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典籍与考古中未被发现),故内蒙古地区早期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论文较少。众所周知,内蒙古地区语言文字研究源于突厥文、苏特文、古回鹘文、契丹文、女真文,以及回鹘蒙古文和八思巴蒙古文。近现代主要研究传统蒙古文或其派生文种托忒蒙古文、满文、索永布文、瓦金达拉文。清末、民国以后大量外来人口向内蒙古迁徙,与内蒙古本地人口不断融合,在东、中、西部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汉语方言,同时也应运而生了内蒙古汉语方言研究。内蒙古地区三少民族,即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有语言无文字,相关研究相对滞后。内蒙古自治区有三少民族研究所,但涉足三少民族语言研究的人短缺。

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文字研究队伍的基本格局仍然是以高校科研单位和专业研究人员为主,以民间团体和业余研究人员为辅,其中知名专家学者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学科布局方面传统学科继续领跑,新兴交叉学科茁壮成长,应用学科不断完善,宏观与微观研究长足进步。

阿尔泰语比较研究、中国北方民族语言研究、蒙古语族语言研究、古蒙古语研究、中世纪蒙古语研究、近代蒙古语研究、现代蒙古语研究、蒙古语方言土语研究以及回鹘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传统蒙古文和中国北方民族古文字、契丹文研究等传统学科领域推出了一些新成果。其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研究水平逐年提高。在提高研究力、提高创新力、提高影响力方面与时俱进,在前瞻性、长远性、时效性方面成绩显著。其中蒙古语方言土语调查与研究尤为凸出。在自治区政府支持下科研机构多角度、大规模、全方位调查蒙古语方言土语的基础上正致力于蒙古语方言土语划分问题研究和方言土语语言文化综合研究。

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蒙古文编码、蒙古文办公软件、蒙古文校对软件、机器翻译、蒙古文网络建设、蒙古语语料库建设、蒙古语资源平台建设初具规模。认知语言学、试验语音学、自然语言理解与语音识别研究等交叉学科领域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但是,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化、规范化、系统化、社会化和产业化方面面临挑战。尤其在蒙古文国际编码统一平台

与手机蒙古文化方面落后于全国水平。

社会语言学、文化语言学、辞书学、术语学等涉及文化变迁、语言习惯、语言态度、语言文字使用问题等应用学科领域的研究逐步深入,在促进蒙古语新词术语的制定、使用、规范以及蒙古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了蒙古语名词术语委员会、蒙古语标准语音委员会、蒙古文正字法委员会和蒙古文信息处理委员会等具有政府职能的4个专业委员会。定期发布名词术语《公报》,为规范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境内八省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和新词术语作了大量工作。

在宏观与微观研究方面,基于现代蒙古语和我国现行蒙古文语音、语义、语法及词汇研究,不但推出了一些最小单位值,即 α 、 α 、 ϵ 等读音规则或监测标准的语言微观研究成果,如《蒙古语标准音水平测试大纲》。还鉴于母语保护、语言安全、语言和谐、语言观念、语言政策、语言教学以及较少民族语言保护和濒危语言抢救工作颁布实施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自治区政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搜集蒙古语及“三少民族”语言自然口语语料,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4000小时或4000万字的“蒙古语自然口语语料库”。

一、阿尔泰学研究

源于19世纪中叶的阿尔泰学^[2]是指研究阿尔泰语系民族语言 and 历史文化或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文字。阿尔泰语系是世界八大语系之一,其中包括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和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有人还认为包括朝鲜语和日语)。阿尔泰语系语言主要分布于亚洲和欧洲的少数地区。操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人口约1亿(不包括日本、韩国、朝鲜)。阿尔泰语系中包括40—50种语言,其中突厥语族语言近20种,蒙古语族语言9种,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语言13种。此外,部分学者将朝鲜语和日语划入阿尔泰语系,那样操阿尔泰语系人口将发生很大变化。

我国是使用阿尔泰语言的最重要的国家,也是阿尔泰语系语言最多、最全的国家,覆盖了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各个语族,是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发祥地。其中包括突厥语族语言: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图瓦语等;蒙古语族语言: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等;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语言: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我国的阿尔泰学研究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学者经过不懈的努力,阿尔泰语系诸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迅速发展,在内蒙古大学清格尔泰教授、中央民族大学耿世民教授等老一辈著名学者的培养指导下,涌现出了一批中青年专家学者从事这项事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内蒙古自治区成为我国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教学和科研的重要基地,并在历史比较研究、描写研究和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发表了《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源流的由来》、《阿尔泰语系概要》、《关于阿尔泰学的理论方法》等文章,出版了相关研究著作,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阿尔泰学丛书》推动了我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研究向纵深发展和向更广领域发展的前景。

著名学者清格尔泰的《关于阿尔泰学的理论和方法》^[3]是该研究重要的代表作。作者

就阿尔泰学研究的历史、存在的问题、研究焦点以及发展趋势作了全面地概述和总结。他认为:“阿尔泰各语言之间,既然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就值得研究,这些共同成分许多都涉及七八世纪以前,甚至四五世纪,那就更值得研究。”本文重点讨论了阿尔泰学研究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如互相借用的成分外,有没有原始同源成分等涉及如何区分借词与同源词,如何对待语音对应规律,如何对语法和词汇进行比较等问题。

二、中国北方民族语言研究

中国北方由于地势平坦、荒漠草原、风土人情创造了在该地区生活的匈奴、鲜卑、室韦、柔然、突厥、蒙古等民族的非凡迁徙能力,他们曾称霸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大多以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很难简单地说他们哪个是民族,哪个不是民族。中国古代对北方民族及其部落的认知只流于表面现象。汉族对于少数民族的称呼,因不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造成了用不同的名称来命名同一个民族的现象,比如铁勒,高车,敕勒等。各类史书对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记载和译音称呼也不尽相同,如回纥、回鹘、畏兀儿、维吾尔等。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间的融合,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始终在延续着,且规模之大,恐怕是我们很难想象的。致使从血统上来说北方民族(包括汉族)的身体里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更难判断和鉴定。匈奴、鲜卑、突厥、铁勒、土谷浑、党项、昭武九姓、康国、安国、何国、史国、石国等民族的流向也很值得研究,是融于汉族吗?还是其他?仅靠一次考古发现和某一现代民族的特征而推论其源流是不明智的,也是不科学的。在中国对上述地区(北方)民族历史、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进行研究的,统称为北方民族研究。内蒙古地区处在这一地区,所以就地区而言它属于北方民族圈。很多研究与此相关,其中包括蒙古学也不例外。但是,北方民族语言研究,一般不包涵蒙古语言文字研究。因为,蒙古语言文字研究内含比较丰富、学科林立、自成体系,并独立于北方民族语言研究。换言之,北方民族研究包括蒙古族,但北方民族语言研究不包括蒙古语言研究。

内蒙古自治区,乃至中国的北方民族语言研究主要围绕研究匈奴语、鲜卑语、契丹语、女真语、满语、突厥语以及达斡尔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展开。发表了《匈奴语试释》、《匈奴语归属问题探讨》、《鲜卑语源考证》、《莫贺非鲜卑语辨》、《契丹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契丹文天干名称考》、《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契丹人的文字》、《契丹小字原字字形规范与原字总表》、《关于山山二字》、《女真语言文字研究》、《突厥文起源新探》、《突厥—蒙古和汉语宗教文化术语及其词源学研究》、《关于女真大小字问题》、《满语助词初探》、《锡伯文》以及《达斡尔语与蒙古书面与语音比较》、《达斡尔语蒙古语的关系》、《论鄂温克语的动词》、《鄂伦春语概况》等诸多研究论文和文章。如沈钟伟先生在《辽代北方汉语方言的语音特征》^[4]一文中分析了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和元代《蒙古字韵》中的八思巴字,进而对北方方言的语音特征进行探讨,并认为古官话的基本语音特征在辽代就已经出现或确立,从而把古官话的形成时间推前至少二百多年。张久和先生在《关于室韦语言的几个问题》^[5]一文中总结和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室韦语言提出了三点意见,即史学界对室韦语言系属的分歧,主要原因是研究者对史书记载的认识不同;室韦语与契丹语大致相同;用比较语言学方

法研究古代部族语言的前提是有明确释义的文献根据。布特戈先生其在《鲜卑语源考证》^[6]一文中通过蒙古语与通古斯语比较、鲜卑与契丹的关系及室韦和契丹语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考证,得出鲜卑语源于蒙古语的结论。李法军先生在《匈奴的语言属性——来自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探索》^[7]一文中运用考古学和人种学的方法对匈奴的语言属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以外贝加尔地区为中心的匈奴主体可能在语言上更接近蒙古语,而中亚地区的匈奴人群操以蒙古语为主,夹杂其他语言的混合语言。韩景林先生在《匈奴语言试析》^[8]一文中通过语义明确或比较明确的词汇、匈奴单于名号的蒙古语、匈奴官号、王号中的蒙古语、匈奴人名中的蒙古语、匈奴语中的蒙古语语法的比较分析和研究,认为匈奴语的语法变化与蒙古语基本相同,句子中的词序也与蒙古语相同,匈奴语的语音与蒙古语的口语语音比较接近,因此推断匈奴语与蒙古语有渊源关系,匈奴民族是蒙古民族的前身或重要组成部分。

三、蒙古语研究

蒙古语隶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语族统领蒙古语、达斡尔语、保安语、东乡语、土族语、裕固语等。蒙古语主要分布于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联邦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卡尔梅克共和国、阿富汗部分地区。中国境内的蒙古语言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河北省、甘肃省、青海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云南、河南、四川等部分地区。就年代而言蒙古语可划分为:古蒙古语、中世纪蒙古语、近代蒙古语和现代蒙古语。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将中国蒙古语划分为东中西三个方言区,即东部布里亚特巴尔虎方言、中部内蒙古方言和西部卫拉特方言。因为蒙古语是跨国界的国际语言,我们认为把蒙古语方言区划分置于某一国或某一地区是不恰当的,是否能打破地区辖属和国家概念在全球范围内划分蒙古语方言区?例如布里亚特方言、巴尔虎方言、喀喇沁方言、科尔沁方言、察哈尔方言、鄂尔多斯方言、喀尔喀方言、卫拉特方言等。

在上述地区和时间以蒙古语言文字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活动均属于蒙古语言文字研究范畴。不过,此次主要收编 20 世纪以后在中国境内出版和发表的以汉文为载体研究成果。为此,我们将根据内容分七个部分来介绍这个时期的蒙古语言文字研究成果。

(一) 综合研究

综合研究是指就蒙古语整体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譬如《现代蒙古语的规范问题》、《论民族标准语的形成与建立》、《蒙古书面语》、《蒙古语》等。其中日本蒙古学者小泽重男先生的《蒙古语的发展——蒙古语言历史梗概》^[9]一文由契丹语、蒙古语书面语、从中世纪蒙古语到近代蒙古语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明了契丹语是蒙古语族语言,以及解读契丹文对研究蒙古语言文字具有的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叙述了蒙古语书面语从 13 世纪至今的 800 年历史,以及作为传播蒙古民族的文化工具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第三部分讲述了中世纪蒙古语到近代蒙古语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形态演变过程。哈斯额尔敦的《蒙古书面语的

历史分期》^[10]一文首先列举前人研究的观点和看法,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作者认为把蒙古书面语(包括口语)的发展历史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阶段。古代阶段是未知时期至16世纪末,其中又分古代前期(未知时期—12世纪末)和古代后期或中世纪(13—16世纪末)。现代阶段是17世纪至今,其中又分为现代前期(17世纪—20世纪30年代)和现代后期或当代(20世纪40年代至今)。作者认为划分蒙古语言的发展历史阶段要把语言的内部发展规律作为主要依据,同时适当考虑社会历史条件,并且强调口语是书面语的基础,书面语要反映口语的变化。

(二) 语音研究

对人类发音和语音的研究使语言学步入了科学时代。人工腭、口腔、仿生气流等与人类发声相关器件的研制,以及计算机和智能软件的研发始终引领着蒙古语研究的科学化进程。自上世纪50年代运用现代语音学理论和引入仿生器件研究蒙古语元音和辅音以来此类研究盛行一时,似乎蒙古语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是人类语言的自然性、特殊性和不可复制性,以及技术工艺的局限性,简单仿生对语音现象分析和语音学研究没有产生革命性的突破。乔姆斯基的生成语法和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对于人类自己创造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使用的自然语言也无能为力。甚至无所不能的计算机和高科技智能软件,如“美国3700”等也无济于事。这就是人类语言的自然性和鲜活性。可是人类对语言现象和语音现象的探索始终没有间断。例如:清格尔泰先生的《蒙古语塞音q、k的历史演变》^[11]一文基于大量的资料和文献基础上,推断出q演变成现代蒙古语的X与G,k演变成现代蒙古语的X与g的规律。作者认为蒙古语原来是不分q与G、K与g的,q与G,k与g分别来源于q和k的分化演变。包力高先生的《蒙古书面语元音间未脱落的辅音ɣ—g》^[12]一文分析和探讨了兰斯铁、符拉基米尔佐夫、服部四郎、鲍培、野村正良等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蒙古秘史》、《穆卡迪玛特—阿拉—阿达布蒙古—突厥语词典》、八思巴文资料以及保安语、东乡语、土族语、东裕固语、达斡尔语等语族语言资料后对蒙古书面语元音未脱落的辅音ɣ~g的原因做出了诠释。他认为蒙古书面语音组合“元音+ɣ~g+元音”中的ɣ~g等辅音脱落与否的区别是由于有不同的辅音来源。即元音间未脱落的ɣ~g是由古代和中世纪蒙古语辅音q~k演变而来的,脱落的ɣ~g是由共同蒙古语或古代蒙古语的辅音*p演变而来的。孟和宝音先生的《蒙古语圆唇元音演变轨迹》^[13]一文通过对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和莫戈勒语等六种蒙古语族语言圆唇元音和蒙古书面语圆唇元音进行比较研究后认为古代蒙古语的圆唇元音是*o和*u两个。而中世纪蒙古语的圆唇元音是o、u、ö、ü四个。那德木德先生的《蒙古语察哈尔土语的元音和辅音》^[14]一文基于多年实地调查察哈尔土语,对其元音和辅音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察哈语土语的元音分为短元音、长元音和复合元音,辅音分为基本辅音和借词辅音,并一一解释和分析。哈斯巴特尔先生的《蒙古语元音屈折现象》^[15]一文研究了蒙古语元音的交替现象和曲折现象。在元音交替部分重点阐述了阳性元音与阴性元音的交替和展唇元音与圆唇元音的交替问题。在元音曲折部分着重论述了语法范畴中的元音曲折现象和词汇中的元音曲折现象。呼和先生的《关于蒙古语的音节问题》^[16]一文根据语音实验数据对蒙古语口语的音节类型、音节界限、有声单位和抽象单位的区别与关系进行了探讨,提出蒙古语口语音节分为22种类型(实际口语中

更多),其中 CV、CVC、CVCv 等音节较活跃。作者指出:区分音节界限时不能把声学语图当作唯一的依据,而应该考虑到蒙古语音节的特点;语言的有声单位和抽象单位之间的区别是有声单位是语言的存在形式,而抽象单位是对有声单位简单化、抽象化和系统化的结果;有声单位远远多于抽象单位;有声单位和抽象单位都是针对某一种语言或方言的,而不是跨语言和跨方言的;有声单位和抽象单位的关系是约定和固定的。呼和先生的《蒙古语元音的声学分析》^[17]一文采用实验语音学的理论和方法,参考《蒙古语语音声学参数数据库》对蒙古语标准音元音进行了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作者认为只有紧密结合实验语音学和传统语音学两个方面才能进一步推动语音学的发展。复合元音连续发不同的音时发音器官不可能作跳跃运动,而是从一个音逐渐过渡到另一个音,这样才能使语言流利悦耳。“过渡段”的发现使语音研究推上新高度,它对语音描写研究和言语工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过渡段”是目前语音研究和言语工程的主要难点和突破口。呼和先生的《蒙古语辅音腭化问题研究》^[18]一文从现代语音学的角度去研究和分析蒙古语辅音腭化现象,并提出辅音的腭化是舌腭接触面积因受到外来因素(前元音)的影响而有所增加的现象,是由协同发音所引起的音段舌位变化。同时作者还强调,辅音腭化和腭化辅音是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是受外来因素的影响而有所增加的现象,后者是辅音本身的固有特点。

(三) 句法研究

蒙古语句法研究相对于蒙古语其他学科研究滞后,其原因除蒙古语句型结构特征和无可借鉴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模式外更主要还是因为研究人员缺乏。很多研究领域尚处在早期的探索阶段,有待后人参与。例如特图克先生的《蒙古语并列复句分析》^[19]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现代蒙古语并列复句分为单纯连接副动词构成的联结方式、连接词和关联语词构成的联结方式及用语序构成的联结方式。特图克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蒙古语句子结构系统》^[20]试图构建蒙古语主从关系句子结构系统的理论框架,并分析和解释了现代蒙古语句子结构分为简单句(双成分句和多成分句)、扩展句(一般扩展句和包孕句)及不完整句(独词句和主格局)。作者强调了复合句是大于(高于)简单句的另一种句法单位、蒙古语句子的基本语法结构是主从结构、句子类别内部成员的地位方面典型类别是处于核心地位,非典型类别是处于边缘地位、句子的“中间类别”的归类问题等。贾晞儒先生的《关于蒙古语复合词的界说》^[21]一文指出分清词组和复合词的区别,必须从语法、语义和语用三者的结合上进行探讨才能解决问题。贾晞儒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蒙古语并列结构的语义关系》^[22]指出蒙古语并列结构在语法层面上并没有高低、优劣等的分别,都是平等的。但语义上,从其顺序的排列中,可以体会到高低、优劣等的区别。德力格尔玛女士的《蒙古语句义间的同义关系初探》^[23]一文分析和探讨了蒙古语句义之间的同义关系,力图揭示蒙古语句义间的同义关系的表现特点和规律。作者把蒙古语句义间的同义关系分为转换同义关系和词汇同义关系两大类,并归纳出各自的表现形式。高莲花先生的《生成句法框架内的蒙古语动词子语类特征》^[24]一文运用生成句法理论的子语类规则对蒙古语动词词项在句中所要求的补足语特征初步分为 12 类,并对这些语类特征做了概括性的描述,进而使蒙古语动词的句法特征形式化和公式化。

(四) 词汇研究

蒙古语词汇研究主要是以蒙古文为自己的研究载体,用汉文研究蒙古语词汇的文章并不多见。这是因为词汇问题涉及民族心理、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文化内涵,所以某种程度上讲很难用汉语表达和准确翻译。特别是文化内涵和深层次的内涵用汉文研究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斯钦朝克图先生的《蒙古语五种牲畜名称语义分析》^[25]一文在界定蒙古语五畜名称的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蒙古语五种牲畜的84名称进行了体状、蹄状、有无峰、毛状、性别、阉割和年龄等方面的列表分析,其中包括分析蒙古语五畜名称的语义场,五畜名称的义素成分,五畜名称的语言特点和文化特点等。哈斯巴特尔先生的《试论蒙古语数词“一”的起源》^[26]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比较分析了蒙古语数词“nigen”的起源及其发展。作者认为蒙古语的“nigen”是emün的派生形式演变而来的。emün来源于“母亲”一词。具体地说,它的整个演变过程如下:emüken→nemüken→nemiken→neyiken→niken→nig。上述两篇文章大胆地探索了此类研究形式,但读者如不是蒙古文化圈的人很难全面理解其内涵。

(五) 辞书研究

发轫于阿拉伯文转写词表和汉文转写词表的蒙古语辞书,经过13世纪的萌芽期,17—18世纪的发展时期,进入到了20世纪的黄金时期,约编纂出版了各类辞书160多部。其中单语词典70部,双语词典71部,多语词典19部。国内外蒙古学界一般习惯于将蒙古语词典编纂与词典研究(词典学)等同起来,并认为蒙古语辞书编纂之日就是蒙古语辞书研究之时。我们认为辞书编纂虽然带有一定的研究成分,但是主要还是以收集和诠释词语为宗旨。人类的一切活动从大的方面讲可分为两大类,即实践与理论,辞书也不例外。我们把辞书编纂划归实践范畴,将辞书研究称之为理论体系。鉴于此,我们不赞同那种“从第一部辞书诞生之日起,辞书研究就应运而生”的庸俗观点。

蒙古语辞书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蒙古语辞书研究略晚于蒙古国。据不完全统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共有50多位专家学者就蒙古语辞书研究撰文110多篇,10部以上教科书和语法书籍将蒙古语辞书研究收入其中。蒙古语辞书研究队伍主要是由辞书编纂者、编辑、教师、研究人员等组成。他们因国别不同、职业差异、视角有别、方法不一难免带有职业倾向,致使他们因研究风格、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而产生学术争鸣。虽然如此,远未形成异彩纷呈的学术观点与流派。例如:达·巴特尔先生的《蒙古语辞书研究》^[27]一文对蒙古语辞书评论、某一辞书研究、蒙古语辞书史研究、辞书编纂研究、辞书的定义、辞书研究的定义、辞书研究的地位以及蒙古语辞书研究存在的问题做了阐述。米吉生先生的《蒙文字母表与蒙文辞书的音序排列》^[28]一文回答了蒙文字母顺序是否要统一和如何统一这两个问题:是否要统一这个问题上作者认为要统一;如何统一这个问题上作者提出了a b c ĉ d e f g h i k l m n g o p r s š t u w y z ž的顺序。

(六) 名词术语研究

名词术语是由表达形式(语言)、反映内容(概念)和客观存在(客体)三个部分组成。

其中术语的表达形式语言是依据人类对客观存在特征抽象了的概念体系,它具有民族性。术语力求达到概念与术语的一一对应,是术语规范化和标准化的目标。在术语命名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有一个共识,即挖掘本民族语言词汇是第一位的;其次是恢复民族语言原有旧词是传承;再次是吸收民族语言的方言土语词;然后是在概念界定和概念定义的基础上创造新词;接下来是翻译成熟的外来语术语;最后借用外来语术语。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蒙古语术语的制定、统一、规范等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定位不准、定义不切、定名不当的问题以及一对多或多对一的多、一对一的少等。术语的定名、定义和定位必须用统一的原则和方法,进而通过规范化和标准化进程来实现这些原则与方法。为此,自治区蒙古语文工作委员会和名词术语委员会就新词术语的制定和统一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学者们也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如《关于蒙古语名词术语的制定和统一办法》、《关于少数民族语言中新词术语的问题》、《关于蒙古语中的新词术语问题》等。其中确精扎布先生的《对蒙语新词术语问题的几点意见》^[29]一文提出了别具一格的观点,即“现在内蒙古蒙古语书面语中的汉语借词不算多,而太少了”,并强调现在主要的危险是书面语远远落后于口语的发展,处于脱离群众的境地。同时还提出用本民族语言创制新词术语的时候必须考虑蒙古族人民口语的实际和语言发展的总趋势,否则就会脱离群众和脱离总趋势。

(七) 信息处理研究

蒙古文信息处理工作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内蒙古自治区科委计算中心嘎尔迪为首的先驱者们从蒙古文字模和编码标准着手,在统计语言学的基础上完成了蒙古秘史研究和百万词统计分析等一系列研究项目,并在很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了排版软件、办公软件、管理软件和应用软件等,一度在字处理和词处理方面走在全国信息处理的前列。很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很多领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发表了不少优秀的文章,如齐德华先生的《蒙文读音输入方法》^[30]一文论述了蒙文读音输入方法的一般规则及实现蒙文读音输入方法过程中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方法。该输入法简单易学、速度快的特点,只用38键就能输入全部蒙文字符。那顺乌日图先生的《蒙古文词根、词干、词尾的自动切分系统》^[31]一文从计算机自动切分的角度对蒙古语构形词尾进行了分类,在传统语法研究成果和计算语言学方法相结合的基础上,把蒙古文近200种词尾分成三大类,再根据各类词尾的不同特点提出了20多组语法条件和若干个生成规则,并初步实现了计算机自动切分。S·苏雅拉图先生等人的《蒙古文整词输入法重码词智能化选择输出方法与技术研究进展》^[32]一文在研究分析蒙古文输入法重码词的基础上提出了词频概率关系选择方法、多变体附加成分组合关系选择方法、短语结构关系选择方法、句法组合关系选择方法、语义组合关系选择方法等5种不同的重码词智能化选择方法。德·青格乐图先生的《蒙古语复合词的语法属性描述》^[33]一文采用分类法和属性描述法对蒙古语复合名词、复合形容词、复合时位词、复合代词、复合动词和复合副词的语法属性进行详细描述,使复合词的各种语法属性更加具体化和条理化,为研制电子版蒙古语复合词语法信息词典提供了理论依据。华沙宝、达胡白乙拉二位先生的《对蒙古语语料库的短语标注》^[34]一文从蒙古语短语句法属性入手,对蒙古语的短语结构和功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蒙古语短语标记